
目 錄

前 言 — i

第一章 中國改革開放的緣起

- 一、「文化大革命」引發的歷史反思 — 2
- 二、改革的經濟動因 — 7
- 三、農村政策悄然轉向 — 12
- 四、擴大引進：為現代化尋找新方式 — 16
- 五、出國考察潮：來自外部的壓力和啟示 — 24
- 六、從國務院務虛會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 32

第二章 從放權、讓利和鬆綁起步

- 一、對農民讓利與鬆綁 — 41
- 二、擴大企業自主權 — 45
- 三、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 — 56
- 四、從擴權到以稅代利 — 60
- 五、國營企業的改組和聯合 — 66
- 六、城鎮集體（合作）和個體（私人）經濟的
恢復 — 72

第三章 國門是如何打開的

- 一、「大引進」遭遇瓶頸 — 84
- 二、22 個引進項目上馬還是下馬 — 90
- 三、外商如何進入中國 — 94
- 四、經濟特區的決策與籌建 — 102
- 五、充滿挑戰和爭議的試驗 — 111
- 六、對外開放再起熱潮 — 121

第四章 農村改革率先突破

- 一、包產到戶在爭論中興起 — 128
- 二、政策是怎麼被突破的 — 138
- 三、覆蓋全國的農村大變革 — 144
- 四、農村經濟超常增長的諸因素 — 152
- 五、農村改革釋放出市場能量 — 155
- 六、鄉鎮企業的蓬勃興起 — 160

第五章 「商品經濟」：第一個重大突破

- 一、計劃與市場：最初模板及其討論 — 168
- 二、在中外交流中開拓思路 — 177
- 三、計劃取向與市場取向的爭論 — 185
- 四、改革理論探索未有止步 — 196
- 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上的重要突破 — 202

第六章 啟動城市改革

- 一、價格雙軌制形成 — 214
- 二、取消統派購制度 — 224
- 三、城市綜合改革試點 — 230
- 四、遭遇總需求膨脹 — 236
- 五、四次省長會議 — 242
- 六、巴山輪會議：目標與過渡 — 246
- 七、「七五」計劃建議的新認識 — 252

第七章 改革的路徑選擇

- 一、整體推進還是局部試驗 — 256
- 二、「價、稅、財聯動」方案的設計 — 262
- 三、「價、稅、財聯動」方案為什麼擱淺 — 266
- 四、從「軟著陸」到再度「起飛」 — 271
- 五、轉向全面承包制 — 276
- 六、股份制及其他試點 — 284
- 七、寬鬆環境是否可期 — 289
- 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改革正名 — 294

第八章 從價格闖關到治理整頓

- 一、年初的方針：穩定經濟與沿海戰略 — 300
- 二、為什麼轉向價格闖關 — 307
- 三、「闖關」受阻及其檢討 — 317
- 四、三年治理整頓：成就與代價 — 324
- 五、治理整頓期間的改革開放 — 331

第九章 「市場經濟」：越過臨界點

- 一、姓「社」姓「資」的爭論 — 344
- 二、1991年：在激辯中醞釀突破 — 351
- 三、鄧小平南方談話 — 358
- 四、中共十四大的突破 — 366
- 五、市場化轉軌已過臨界點 — 373

第十章 從計劃到市場：突破如何成為可能

- 一、中國改革的歷史背景與起始條件 — 385
- 二、漸進式改革的路徑選擇 — 388
- 三、農村改革率先突破釋放出市場力量 — 393
- 四、開放推動了改革 — 398
- 五、地方政府的作用 — 402
- 六、開放的決策機制 — 407

人們一般稱 1978 年為改革元年。然而，對於中國的大轉向來說，1976 年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年份。這年秋，毛澤東去世，緊接着粉碎「四人幫」，以非常規的方式結束了持續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歷史轉軌的機會已經出現，「文革」的災難性後果引發一場集體性反思。中共高層開始醞釀結束無休止的政治運動，集中精力於國家現代化目標。從 1977 年開始，出現了一連串的變化。制定現代化規劃、擴大技術引進、出國考察、醞釀經濟改革等都在這兩年開始了。在 1978 年最初醞釀改革開放問題時，並沒有發生太大的分歧，華國鋒的態度是積極的。依當時的情勢，無論誰在台上，都需要尋找中國發展的新路子。當然，如果沒有「文革」，啟動改革不可能獲得這麼大的推力。而如果沒有大批人員出國考察感受到的挑戰和機遇，中國領導人也不會有那麼強烈的緊迫感，要達成改革共識會困難得多。

一、「文化大革命」引發的歷史反思

中國改革何以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啟動？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因為有一個「文化大革命」。我要說的是，改革發生在「文革」後，改革的因子已經在「文革」期間伏下了。一場以理想主義為標榜的政治運動，異化為普遍的暴力、持續的派性鬥爭和詭譎的黨內權爭，「文革」的正當性由此而喪失殆盡；1971 年的「九一三事件」加速了這一進程，它在黨內及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使得「文革」的解釋體系瀕

洞百出，催生了人們的思想覺醒。1976 年清明節前後，被稱為「四五運動」的抗議活動，呈現出與以往運動完全不同的特性，它是一次真正自發的羣眾運動，表面看是發泄對「四人幫」的憤怒，背後卻是指向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參加抗議的主力正是全程參加過「文革」的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識分子。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思考「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一批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親身感受到農村的落後與貧困，他們在「文革」中後期相互聯絡，交流情況和看法，討論中國農村發展道路問題，不少人在 80 年代的改革中嶄露頭角。

不只是年輕人，還包括黨內一些老幹部。胡耀邦說：「從 1969 年到 1976 年以前，表面上看來好像風平浪靜了。實際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滾滾、洶湧澎湃。」毛澤東想通過「文革」改造「舊政府」，但治理國家別無選擇，還得靠老幹部。事實上即使在中共九大前，政府工作也是由「解放」出來的領導幹部操辦的，雖然不見得是同一批人。「九一三事件」後，更多老幹部被「解放」出來。然而，這批人不可能如毛澤東所願接受「文革」路線，「正確」對待自己的不幸遭遇。毛澤東很清楚，對「文革」「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¹「文革」聚集了否定「文革」的力量。1975 年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實際上是在當時形勢允許的限度內糾錯「文革」、扭轉頹勢的一次努力。

「文革」也造成一種機會，使各級領導人更加接近底層，

1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第 1781-1782 頁。

直面一個真實的中國，這或許有利於他們思想解放。就如1961年中央常委和各地領導人下農村目睹農村的慘狀，推動了當年的政策調整一樣。後來的事實也是如此，從擺脫「文革」噩夢這一點看，多數重新出山的老幹部都有改革的願望，而且從中央到地方出現了一批銳意改革的官員，「文革」為改革準備了幹部。

「文革」帶來了兩大災難性後果：一是傷人太多，它把所有的階層，特別是精英階層傷害了；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問題已經成為重大的政治問題。這兩個問題促使黨內和知識界對於我們過去所走過的道路進行深刻的反思。鄧小平多次談到「文革」與改革的關係，他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裏。為什麼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¹「文革」結束後，思想閘門在逐步打開，黨內和民間形成了一個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黨內，其標誌是1978年由胡耀邦組織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這場討論的直接起因，是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特別是在「解放」老幹部和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上遇到了阻力。正是這場輿論戰，突破了許多重大禁區，推動了全國範圍的平反和一系列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進程，數以千萬計的人獲得了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解放，中共內部的權力結構也發生了改變。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1133、1244頁。

思想解放推動了經濟領域的撥亂反正。1977年、1978年經濟領域撥亂反正涉及的重大問題有四個：一是糾正否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錯誤觀點，重新肯定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二是糾正對所謂「資產階級法權」和按勞分配原則的錯誤批判，重新強調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三是糾正對「唯生產力論」的錯誤批判，強調生產力發展在社會主義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實上提出了體制評價的生產力標準；四是提出按經濟規律辦事，提高經濟管理水平。這些問題的討論受到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領導人的重視和肯定，特別是鄧小平直接推動了這個討論。¹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貫徹執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發表前，鄧小平就看了兩遍，並兩次找起草者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羣談意見。²另一本影響很大的著作——林子力、有林的《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最後也是因鄧小平批示「可以出版」才得以正式出版。³這一時期，鄧小平講得最多的是按勞分配問題。在他看來，物質利益原則仍然是調動積極性以加快發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作為這種思路的體現，1977年、1978年調整了部分職工的工資，恢復了計件工資和獎金制度。

1 參見韓鋼《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經濟理論大討論述評》，《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6期；李正華：《中國改革開放的醞釀與起步》，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

2 李正華：《中國改革開放的醞釀與起步》，第102-104頁。

3 林子力訪談錄，見陳敬編《經濟理論20年——著名經濟學家訪談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379頁。

有些經濟學家的思考，已涉及整個計劃體制。如薛暮橋 1978 年 4 月給鄧小平、李先念寫信，就提出研究計劃管理體制問題。6 月，薛暮橋通過對江蘇和北京的調查，得出一個基本看法：現在的管理體制的根本缺點是，不管條條管，還是塊塊管，都是按行政系統管，既割斷了各行業之間的經濟聯繫，也割斷了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經濟聯繫。這種條塊分割體制的典型弊端是：兩個企業能商量解決的問題卻必須層層上報，由上級領導機關協商解決，一天能辦成的事，往往要拖上幾個月。他舉例說：常州東風印染廠的燈芯絨是國際市場的暢銷品，為增加生產，需要多進口染料，沒有外匯，要向香港中國銀行貸款。銀行完全同意，但必須層層上報到中國銀行北京總行，打了十幾個圖章才辦完手續；增加染料進口又要外貿部批准，又層層上報打了八個圖章。辦完兩項手續花了八個月時間，如果准許該廠直接向香港中國銀行貸款，直接在香港自己購買染料，只要半天時間就夠了。他還看到，在江蘇，國營企業的發展速度不如地方五小工業，地方工業的發展速度又不如社隊工業。因為地方工業留利比例（60%）超過國營企業（利潤全部上繳），而社隊工業的留利比例（80%）又超過地方工業。¹薛暮橋認為，解決經濟管理體制的根本問題，不僅是解決條條與塊塊之間的矛盾，而且要解決行政管理與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之間的矛盾。²

1 薛暮橋：《對於計劃管理體制的一些意見》，《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79 年第 71 期。

2 薛暮橋：《對於計劃管理體制的一些意見》，《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79 年第 71 期。

撥亂反正不止於回到「文革」前，積極投入撥亂反正的不少人已經具備了改革意識。由撥亂反正走到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正如于光遠所說：「從『撥亂反正』到改革的一個重要環節是明確體制評價的生產力標準。」¹許多人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先經濟後政治，或者說是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但鄧小平自己說：「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²中國改革的真正起點，恰恰發生在思想政治領域。一是人的政治解放，就是全面平反歷史錯案，解決各領域的歷史遺留問題；一是人的思想解放，就是對歷史的全面反思和總結。如果沒有政治、思想領域的變革作先導，經濟改革不可能推動。

二、改革的經濟動因

「文革」結束時，中國陷入經濟和民生的嚴重困局。1977 年 2 月 12 日國家計委的彙報提綱透露，幾年來，國民經濟增長緩慢，工業生產 1974、1976 兩年停滯不前，1976 年只增長 0.6%，鋼產量倒退五年，不少重點工程形不成生產能力，財政連續三年出現赤字，1976 年財政收入只有 750 億元，相當於 1971 年的水平。³有人估計，「文革」對經濟造成的損失

1 陳敬編《經濟理論 20 年——著名經濟學家訪談錄》，第 12 頁。

2 鄧小平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的談話（1986 年 9 月 3 日），《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134 頁。

3 房維中：《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1977—1989）》（1977—1978 年卷），未刊稿，第 13 頁。